

書 叢 年 青

中國史上之民族詞人

著 錢 繆

行 印 社 版 出 年 青

書 叢 年 青

中國史上之民族人

著 錢 繆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行

RW7614/15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一——三一〇〇）

中國史上之民族詞人

每冊定價國幣三十五元

著 者 繆 鉞

印 行 者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青 年 印 刷 所

上清寺桂花園九十九號

總 經 售 青 年 書 店 總 管 理 處

重慶民生路

★ 有 所 權 版 ★

編輯凡例

一、本書乃普通讀物，非專門撰著，故陳義力求淺顯，解釋不厭詳盡。

二、本書中於各家代表作品，選錄頗夥，以供讀者欣賞之用，蓋雖論述民族詞人之書，同時亦不啻一冊民族詞選也。

三、詞爲中國文學中一種體裁，自有其特性，苟不明此，則將不能深解其意味，評衡其高下，因之亦不能識作者之情志襟懷，故本書中於詞體流變及其特性，多所說明。

四、荒陬僻處，倉卒成書，采獲未豐，疏誤難免，讀者指正，極所樂受。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繆鉞自識於遵義。

中國史上之民族詞人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南宋初之民族詞人

第三章 辛棄疾

第四章 辛派詞人

第五章 南宋末之民族詞人

中國史上之民族詞人

第一章 緒論

中國文化以儒家學說爲中心，而尊夏攘夷爲儒家學說中之要義，尊夏攘夷，卽今人所謂「民族主義」也。孔子爲儒家之大哲，中國文化之中心人物，生平極富於民族思想。孔子論管仲，責其「器小」，責其「不知禮」，而又極推尊之，稱之曰「仁」。孔子評論人物，未嘗輕以「仁」字許之，而獨稱管仲曰「仁」者，何哉。蓋當齊桓公之時，中國衰微，王室不振，北有戎狄，南有荊楚，皆恃其強暴，馮陵諸夏，管仲輔齊桓公富國強兵，首創霸業，尊王室，盟諸侯，使中國民族團結爲一，然後南征北伐，保安華夏，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錄其保衛民族之大功，而恕其小疵，略其微瑕也。孔子修春秋，亦嚴夷夏之防，內中國

而外夷狄。凡此皆見孔子之注重民族觀念。蓋惟先保民族之生存，而後此民族所創之文化學術始能有所寄託，始能發揚而持續以貢獻於人羣；亦惟能長保民族之生存，而後此民族之文化學術，始有更偉大之價值。不然，己不自立，安能立人。吾華夏爲一種富於民族思想之民族，而其對於民族之區分，竟夏之判別，則以文化爲標準，非僅基於狹隘之血統觀念，故一方面主張「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一方面又主張「夷狄而遂於中國則中國之」。此兩種觀念互相爲用，故當微弱艱危之時，則能忠勇奮發，堅貞踔厲，抗禦外侮，以保民族之生存，而當昌隆盛大之際，則不僅以武力征服外族，而又能以文化同化之，有寬大之襟懷，高遠之理想。故中國民族立國以來，擴土萬里，同化諸族，雖亦屢遭外侮，然終能弱而復振，亡而復興，數千餘載，永存於天地之間，皆賴此種極強之民族思想深中於人心，潛移默運，其力至偉也。

中國古人之民族思想，固常發揮於哲學歷史等著述之中，而尤多表現於文學作品。中國文學以詩三百篇爲最古，三百篇中卽多發揚民族精神之詩歌。當西周末年，王懿不

振，四夷交侵，宣王中興，北伐獯狁，南征蠻荆，東平淮夷，中國之聲威一震。詩人美之曰，「薄伐獯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小雅六月）此獯狁吉甫之征獯狁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中略）顯允方叔，征伐獯狁，蠻荆來威。」（小雅采芣）此顯方叔之征蠻荆也。又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中略）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大雅江漢）此顯召虎之平淮夷也。自幽王爲犬戎所殺，豐鎬王畿，污於殽隄，其後秦人起而逐犬戎，盡有西周故地，爲王室折衝禦侮，秦風無衣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可以見其威武之概。而小戎一詩，修陳兵甲之盛，以美伐狄之事，雖駿琕琕，尤爲傑作。齊桓稱霸之時，魯僖公從之，北伐狄狄，南征荆舒，魯頌閟宮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以齊桓攘夷之功，而歸美魯僖，雖不免稍涉夸大，而詩人尊中國之心，固可嘉也。自漢以降，中國民族盛衰靡定，當其盛時，固有闔僉登皇之篇章，以「揚大漢之天聲」，而當蠻夷猾夏中國微弱之時，尤多感憤

悲壯之作。雖土宇淪陷，宗社覆亡，禹甸神州，受制異族，而在此感憤悲壯之民族文學中，非徒見當時忠義之奮發，人心之不死，且正氣常存，可以感召後世，爲復興之基。故此種民族文學之傑作，不但治文學治歷史者應加以欣賞研究，凡我國人，皆宜熟誦深思，可以仰見先哲之忠誠，而爲自己修養之資藉也。

有宋一代，外患最烈，故宋人民族觀念最強，而民族文學。亦多傑作。宋太祖承五代數十年擾攘之後，一旦由軍士擁立而爲天子，得國甚易。太祖爲人，機警慎密，鑒於唐末以來武人跋扈之禍，廢置天子，有如弈棋，深知欲長治久安，必須削減武人兵權，卽位以後，卽努力推行此種政策，故於建隆二年（卽太祖卽位之第二年）遂有所謂杯酒釋兵權之事。自此藩鎮割據之弊漸革，重用文臣爲地方長官，兵財之柄，束之於上，束之不已，其結果至於郡縣空虛，本末俱弱，故宋代絕鮮武人跋扈之禍，而兵力亦遠遜漢唐之盛。宋太祖削平南方諸國，而終不能收復石晉時割讓於契丹之燕雲十六州。太宗兩次北征契丹，均敗歸，相傳其死卽由於箭創之發。真宗時，澶淵之役，孤注一擲，僅能

自守。其後西夏興於西北，對宋又增一威脅。仁宗時，諸賢在朝，國勢尙盛，而對契丹及西夏講和議，輸歲幣，僅能保持三方鼎峙之均衡局面。及金人興於東北，鐵騎南下，風馳電掣，滅遼之後，轉而及宋，遂有靖康（欽宗年號）之禍。汴京淪陷，徽欽被虜，康王卽位於南京，（今河南歸德）是爲高宗。當時金人兵力甚強，不但蹂躪黃河南北，且渡江南犯，入建康，（今南京）陷臨安，（今杭州）明州，（今甯波）高宗幾爲所擒，入海而免。但金人兵力雖猛，然如秋風之一掃而過，所得中原諸地，並未凝固，而南宋名將輩出，國力漸強，吳玠，吳玠，岳飛，韓世忠，劉錡等屢敗金人，雖未能直搗黃龍，然中原未必不可徐圖恢復。當時識者，莫不主戰，惟高宗別懷私心，恐金人擁立欽宗，奪已帝位，故重用秦檜，不惜罷戰勝之兵，戮忠勇之將，忘君父之大仇，遠舉朝之正論，向金人稱臣獻地，歲輸重幣，以求和議，絕宋室興復之望，而與敵人以整理中原之機會。高宗在位三十餘年，傳位孝宗。孝宗英明，有志恢復，然當時情勢，已非昔比，中興將才，零落已盡，偏安既久，人心萎靡，不似南渡初之激昂，而國內敵政，莫端特

理，故朱熹謂言規恢於紹興（高宗年號）之間者爲正，言規恢於乾道（孝宗年號）之間者爲邪。金據中原，已漸穩固，世宗爲治，亦頗賢明，無可乘之機，故僅能稍改和約，宋得稱皇帝，稱金主爲叔父，略減歲幣而已，甯宗與韓侂胄，韓侂胄北伐，大敗，復議和，宋金爲伯姪，又增歲幣。此後南宋君臣歌舞湖山，彌以不振。及蒙古崛起朔漠，滅夏滅金，乘戰勝之威，大舉南下，入臨安，廢帝尊，復遜帝歸於崖山，帝昺赴海死，宋遂再爲更狄所滅。總觀有宋一代，北宋雖弱，尙能保境，靖康之難，爲西晉宋劉石亂華以後中國史中第二次蠻夷猾夏之大禍，國亡君廢，無巨痛深；南渡之初，極可有爲，而爲高宗私心所誤，甘於屈辱求和，孝宗雖抱恢復之志，時勢已不易爲，韓侂胄志大才疎，卒於復敗，其後屢接委靡，至於再亡於夷狄。南宋一百五十餘年之中，國勢人心，有可爲痛哭流涕者，志士仁人，忠義之氣，壯烈之情，多發之於詞。吾人讀歷史，見南宋忍辱積弱，以至於亡，實則此乃爲君相所誤，若一讀當時雄壯悲憤之詞，則知其時人心激昂，虎虎有生氣，百餘年中，未嘗一日忘君國之仇，浪恢復之志，惜乎在上者不善用之。

耳。此種詞雖託之空言，無補實事，然發抒忠憤，情辭壯美，由此可見吾國古人民族觀念之強，微弱之時，益能自振，而對後人感發興起之功甚大，不徒供文學之欣賞而已。詞爲宋代盛行之文學，最足以表現時人心情，故南宋人愛國家愛民族之情緒，多發抒於詞。藉詞體澀辭之美，達其激壯怨抑忠憤悲涼之懷，而民族詞人忠義壯烈之情，鬱積難言之隱，亦足以提高詞之價值，而增其光彩，兩者可謂相得而益彰。茲先略述詞之起原及其流變，然後可以論民族詞人之詞。

詞爲中唐時所發生之一種新文學體裁，（李白菩薩蠻憶秦娥諸詞不可信，近人辨證已明。）因供樂歌之用，當時人稱之曰「曲子詞」，後遂簡爲「詞」。唐人本以詩入樂，詩爲整齊之五七言體，而樂調曲度則長短參差，以整齊之五七言詩，譜入長短參差之樂調中，終不甚適合，最初詩人作歌辭，伶工譜樂曲，各不相謀。其後通音律之詩人，受音樂之影響，覺整齊之律絕體不甚適宜於樂歌，於是依樂譜而試作長短句之歌辭，如韋應物作闌笑，劉禹錫白居易作憶江南皆是。但韋劉白諸人，僅偶爾嘗試，以應歌唱，及

溫庭筠出，「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以超逸之天才，努力於此種新文學之試作，精美綺豔，自抒哀樂，而不專在應歌，流風所被，作者漸多，於是詞遂在五七言詩之外自成爲一種新體裁矣。（近人或據敦煌卷子中之雲謠集雜曲子謂盛唐已有詞，或以樂府詩集近代曲辭中隋煬帝及王冑所作之紀遼東爲倚聲填詞之祖，其說皆未盡當。蓋敦煌卷子，據近人考訂，皆以爲唐宋五代時物，如謂雲謠集雜曲子乃盛唐作品，不知何據，詞爲唐代新興之音樂文學，詞調皆出於燕樂，燕樂創始於唐武德貞觀之際，隋煬帝時尙無燕樂之名，安得有詞，若謂句法有長短，而又依照格式填寫之歌曲卽謂之詞，則此類之作，遠在三國末年韋昭時已有之，豈可謂詞已濫觴於三國末年哉。友人唐鎮君曾作「李白菩薩蠻憶秦娥詞辨僞」一文，於此問題討論甚詳。）

詞興起於中晚唐，滋衍於五代，至北宋而大盛。上自宮庭，下至里巷，無不歌詞，凡讀詩書通文墨者無不能作詞。文學藉音樂之傳播，最能影響時人心情，使之愛好，使之沈醉，故著名詞人之作，皆傳唱天下，「凡有井水處，必能歌柳詞，」後世傳爲美談，

實則非獨柳永一人如此，宋代名詞人幾皆有此種榮遇也。北宋初承晚唐五代之風，文人所作，多爲令詞，至宋仁宗時，柳永始大作慢曲。據雲謠集雜曲子，知晚唐人已有長調，特皆出於民間無名作者，文人鄙夷，不屑嘗試，柳永爲人，放蕩無檢束，日與儇子縱游倡樓酒館間，故肯就俚曲爲新詞。柳永天才甚高，所作筆力健拔，體勢開拓，其後蘇軾，秦觀，周邦彥等繼之，慢詞遂盛。小令簡短，只數十字，慢詞較長，率爲百餘字，且有長至二百餘字者，故小令僅含蓄言情，慢詞則可以鋪敘，小令多出以渾融，慢詞則可有層次，自慢詞興，而詞體遂益恢拓矣。柳永於詞體雖有恢拓之功，而柳詞內容，仍承晚唐以來傳統之習，多言兒女之情，故增擴詞之內容而提高其境界，則有待於蘇軾。詞之初起，本以應歌，歐陽炯花間集序所謂「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可以想見初期唱詞作詞之環境。故晚唐五代人詞，多言男女，或寫容色之美，或述相思之情，其風格則不外淒婉哀怨。北宋以來，天才之作家輩出，詞之意境，雖漸提高，而內容及風格，猶多守傳統之習，如范仲淹，歐陽

條，政事氣節，文章學術，爲一代偉人，而所作小詞，皆婉轉悽愴之語，詞云：「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蘇幕遮）又云：「殘燈明滅枕頭欹，語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御街行）歐詞云：「水精雙枕，旁有鬢奴橫。」（臨江仙）又云：「人面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玉樓春）蓋當時風氣如此也。至蘇軾出，始擺脫詞文體種種傳統之限制，而加以解放。蘇軾作詞，乃視詞爲一種新詩體，不必限於樂歌，故不必拘拘剪裁以就聲律之束縛，而詞亦不必專言兒女之情，「可以詠史，可以弔古，可以說理，可以談禪，可以用象徵寄幽渺之思，可以借音節述悲壯或怨抑之懷。」因有新內容，新意境，於是產生新風格，非淒婉哀怨，乃悲壯與飄逸，胡寅謂蘇詞「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頗可形容此種新風格。王灼碧雞漫志謂「東坡先生非醉心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此語頗能指出蘇詞蛻故變新之功。詞之初起，範圍甚小，體制甚多，文人多視爲餘事，寄託閒情，自柳永於小令之外，創爲慢詞，詞體始漸開拓，自蘇軾以詩爲詞，創

立新風格，增加其內容而提高其境界，詞體始益解放，故南宋人忠憤壯烈之民族情懷，遂得藉詞以發抒，傷時感事，慷慨悲歌，較之晚唐五代以來綺羅香澤之態，迥不侔矣。

若就兩宋三百年中詞之流變而論，詞至南宋，風氣實漸衰敝，故古人論詞者多主北宋。南宋詞之所以漸衰者，其故有三。

(一) 凡一種文學體裁之演變，大抵初起時多渾成自然，生新活潑，其後漸重技術，

漸重雕琢，以人巧掩天機，遂流爲匠氣，趨於衰敝。晚唐五代詞天機多，無意求工。

而自然美好，北宋詞天機人巧各半，如周邦彥詞雖極經意而尚能渾成，不傷於雕琢，至

南宋則彌重技術，人巧勝而天機減矣。張炎作詞源一書，對於句法，字面，虛字，用事，

詠物，皆特加討論。陸紹詞旨亦云，「造語貴新，煉字貴響。」又云，「史梅溪之句

法，吳夢窗之字面。」其書中於屬對，聲句，詞眼，皆特別標出，屬對如姜夔詞之「翠

葉吹涼，玉容消酒」，史達祖詞之「做冷欺花，將烟困柳」，聲句如范成大詞之「花影

吹簫，掃地淡黃月」，劉過詞之「香暖雲屏，更那堪酒醒」，詞眼如李清照詞之「留柳

嬌花，「吳文英詞之「醉雲醒月。」此皆可見南宋人論詞作詞注重字句之琢鍊。夫雕琢日精，則性情日淺，易流爲匠氣。南宋詞之所以衰敝，此其一因。

(二)詞雖可歌，而作詞時過重音律，反妨情辭之美。北宋作者，多疎於音律。李清照謂歐陽修蘇軾「作小歌詞皆句讀不葺之詩，又往往不協音律。」晁無咎評蘇軾詞亦曰，「居士詞，人謂多不協音律。」陸游亦曰，「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惟其如此，故能暢所欲言，所謂「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張炎詞源論詞之音律，謂「美成負一代詞名，而於音譜且間有未諧，可見其難。」余謂以周美成之精通樂律，非不能盡協音譜，蓋不欲以聲律害其情辭之美，遇情辭與聲律二者不可得兼之時，甯犧牲聲律而保全情辭，惜乎張炎之不足以知此意也。南宋人作詞，則極重音律。楊鐵論作詞五要，第一要擇腔，第二要擇律，第三要句韻按譜，第四要推律押韻，第五要立新意，五要中關於音律者四。張炎詞源曰，「先人（張樞）曉暢音律，有寄間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每作一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卽改正。曾賦瑞鶴仙